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全文收录期刊

海派经济学

Journal of Economics of Shanghai School

第 10 卷 第 2 期, 2012 年 VOLUME 10·NUMBER 2·2012

程恩富 张吉明 发展公有经济 实现共同富裕——访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

李炳炎 “中国模式”的完善与“分享型经济发展方式”

王朝科 论经济力的系统结构及其辩证运动

王志林 关于《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恩格斯”词条的探讨及其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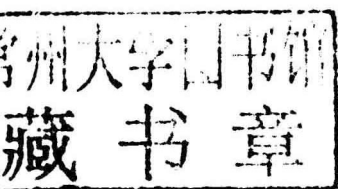
周文 杨先明 经济危机本质新论——基于财富权力视角的分析框架

王璐 杨阳 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与诠释：马克思和明斯基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海派经济学

(第 38 期)



程恩富 顾海良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派经济学.第 10 卷.第 2 期:总第 38 期./程恩富,顾海良主编.-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642-1467-8/F·1467

I.①海… II.①程… ②顾… III.①经济学-丛刊

IV.①F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9747 号

- 责任编辑 汝 涛
- 封面设计 张克瑶
- 责任校对 卓 妍 胡 芸

HAIPAI JINGJIXUE

海派经济学

程恩富 顾海良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宝山葑村书刊装订厂装订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12.5 印张 237 千字

印数:0 001-1 500 定价:24.00 元

海派经济学

Journal of Economics of Shanghai School

学术顾问

刘国光
项启源
于祖尧
李成勋
杨圣明
吴树青
胡代光
刘方域
卫兴华
吴易风
周新城
胡 钧
刘海藩
丁 冰
张薰华
洪远朋
袁恩桢
吴宣恭
谭崇台
刘思华
陈 征
高 峰
杨承训

主 编

程恩富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顾海良 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
教育部党组成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

副主编

马 艳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
丁晓钦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秘书长
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 奎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王振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副所长
林 岗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地区和国家为序)

左大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
胡乐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余 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方福前 中国人民大学
张 宇 中国人民大学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
王志伟 北京大学
吴 栋 清华大学
孟 捷 清华大学
朱安东 清华大学
李 翀 北京师范大学
白暴力 北京师范大学
文 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王天义 中共中央党校
郭 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董正平 首都师范大学
刘永佶 中央民族大学
冯金华 上海财经大学
马 艳 上海财经大学
顾钰民 复旦大学
张晖明 复旦大学
王朝科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周肇光 上海金融学院
何干强 南京财经大学
李炳炎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葛 扬 南京大学
朱炳元 苏州大学
逢锦聚 南开大学
何自力 南开大学
李家祥 天津师范大学
颜鹏飞 武汉大学
简新华 武汉大学
龙 斧 武汉大学
刘思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方兴起 华南师范大学
李建平 福建师范大学
黄茂兴 福建师范大学
庄宗明 厦门大学
周小亮 福州大学

目 录

专 访

发展公有经济 实现共同富裕

——访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 程恩富 张吉明(1)

论 文

“中国模式”的完善与“分享型经济发展方式” 李炳炎(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分析

马 艳 邬璟璟 王祉淇(26)

关于收入分配的几个基本理论与相关财政政策问题 张忠任(36)

论经济力的系统结构及其辩证运动 王朝科(43)

资本权力、技术变革与利润率

——资本积累模式及其危机的可能性路径 骆 楨(56)

利润率趋向下行规律及其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走势分析 鲍金红(82)

《资本论》中的经济发展思想 陆 昱(93)

关于《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恩格斯”词条的探讨及其启示

王志林(101)

经济危机本质新论

——基于财富权力视角的分析框架 周 文 杨先明(112)

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与诠释:马克思和明斯基 王 璐 杨 阳(132)

利用外资质量的定量评价及提高对策

——基于我国西部地区建设生态屏障视角的分析

龚晓莺 杨小勇 杨文婧(145)

英国济贫法的历史演变对中国反贫困制度内核修复的启示 汪洪涛(153)

人 物

资学兼长 大巧不工

——白暴力教授学术思想述评 白瑞雪(165)

综 述

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下的中国与世界

——上海财经大学中外马克思主义论坛综述 丁晓钦(184)

CONTENTS

Interview

Develop Public Economy and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An Interview with Eminent Economist Cheng Enfu
Cheng Enfu Zhang Jiming(1)

Paper

The Consummating of China Model and the Ways of “Economic□Sharing” Development Li Bingyan(14)
Analysis o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 Yan Wu Jingjing Wang Zhiqi(26)

Several Basic The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 Relevant Issues of Fiscal Policy Zhang
Zhongren(36)

Discussing the System Structure of Economic Power and Its Dialectical Movement Wang Chaoke(43)
Power of Capital,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Profit Margins:The Paths of Possibilit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Mode and Its Crisis Luo Zhen(56)

Profit Margin Tend to Decline in the Regularity and Its Trend Analysis in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Economy
Bao Jinhong(82)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nking in “Das Kapital” Lu Yu(93)

Engels and His Enlightments in The New PalGrave: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Wang Zhilin(101)

The New Theory of Economic Crisis:Based on Analysis Framework of
Perspective on Wealth and Power Zhou Wen Yang Xianming(112)

Comparis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ory of Economic Crisis: Marx and Minsky
Wang Lu Yang Yang(132)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Improving: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China Build an Ecological Barrier
Gong Xiaoying Yang Xiaoyong Yang Wenjing(145)

The Inspirations of Anti□Poverty Ststem Restoration in China from British Poor Laws’ Evolution
Wang Hongtao(153)

People

Short Comments on Prof Bai Baoli’ s Academic Ideas Bai Ruixue(165)

Overview

China and World under the Wester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Review of Chinese
and Foreign Marxism Forum Ding Xiaoqin(184)

发展公有经济 实现共同富裕

——访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

收稿日期:2012-04-05

作者简介:程恩富(1950-),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之一、国家社科基金等评委。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主编《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和《国际思想评论》英文国际杂志及《马克思主义研究》、《海派经济学(季刊)》和《管理学刊》。张吉明,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程恩富 张吉明

内容提要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共同富裕”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前,私营企业初次分配悬殊,是导致贫富分化的首要原因。化公为私的私有化改制,是导致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要想从根本上推动共同富裕,必须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高度,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在政策实践上,坚持邓小平同志“两次飞跃”论的思想,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推动股份合作制的发展;高效利用外汇;加强自主创新;警惕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误导中国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反对私有化。

关键词 共同富裕 公有制 私有化

中图分类号 F0-0

张吉明、齐泽垚、高丽萍(以下简称张吉明等):尊敬的程院长,您好!首先请谈谈今年“两会”您提交的议案情况。

程恩富(以下简称程):好的。有几个建议,其中第一个是关于推动共同富裕的建议。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大概有六七次专门提到过,指示要在上世纪

末和本世纪初特别解决防止两极分化出现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突破 0.4 以上。同时,社会上议论也比较多,历次“两会”前,有关媒体都在做专访、各种涉民的民意测验。实际上,关于贫富分化和共同富裕问题,一向都是十大社会关注的问题之一。我们作为研究者也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这次也想趁这个机会正式向国家有关方面提出能够推动这项工作的政策建议。

张吉明等:这个建议很好,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当中专门提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逐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您能谈一下共同富裕有哪些内容吗?怎样促进共同富裕?有哪些方法,最根本的方法是什么?

程:我在建议里面首先分析了原因,即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原因是什么,其次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最后对反对我们推进共同富裕的错误思潮和做法做一些批评性的回应,共分为这三个部分。

张吉明等:这个很好。尤其是批评性的回应更能说明问题,更能教育大家。请您再详细谈一下,好吗?

程:关于贫富分化加大的首要原因,还是由于所有制结构的变动。具体来说,就是非公经济的快速大规模地发展导致了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里面,也就是在企业分配这个层面上,财富和收入的分化现象最为严重。这个道理很简单,比如说,我是私营企业主或者说我们两三个私营企业主联合办了个饭店,雇用了 200 个工人,工人主要是拿工资或者再拿一些奖金,利润主要是归私营企业主所有。这里面还有很多名堂,如果撇开这些名堂不算的话,那么企业是我一个人办的,利润就是我的,或者是两三个投资者的,总之就是我们两三个人的。这样,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就把财富和分配的差距一下拉大了。一个是按资分配,一个是按他的管理劳动的内容和特点进行分配,这样就可能一下再拉大,而且可能是十几、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差距了。而工人的劳动力价格低,原因之一是因为劳动力供求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的价格。因为我国的农民工比较多,剩余劳动力也比较多,他们在就业方面是有难度的。工厂外面有几百个人甚至几千个人等着就业,这就是为什么珠三角和南方其他一些地区,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劳动力的收入都没有提高的原因。劳动力大军中潜在的、公开的失业者大量存在,这对在职人员收入的提高极为不利。就是说,如果你要求提高收入,那我就不要你了,我去找另外一个人。当然,还有用工制度,国家尽管有规定,但是作为私有制仍然是有各种规避的办法,既有合法的规避,也有不合法的规避。政府有关方面的工作又不是很到位。这种情况下,往往工人的利益就受损,而资方的利益不适当地得到了肯定和保护。这样,在初次分配中,这种差距被拉大了。这个是首因、是主因。有人认为这不是主因,首因就是再分配。也就是说,国家是不是对高收入的人多收一点税,或

者是施行一定程度的累进税,我们现在也在做。应当承认高额的累进税,肯定会对改善当前的状况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只是对财富收入和再分配起到了一个微调。原来可能是 50 倍、20 倍的差距,现在调节以后可能会少了一半,但是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所以,国民收入再分配方面肯定需要采取措施。比如说,现在有关税务方面,私营业主一年的工资性收入是 200 万元,其实私营业主在个人收入中并没有体现去拿这个 200 万元,因为如果拿了这 200 万元,那么私营业主就要按 200 万元去缴个人所得税。现在据说私营业主是不拿的,他消费什么就去报销。这个国家还没有管,这一部分的钱积累很多,每年一二百万,几年下来就是几千万了。对于这一部分收入,政府没有采取严格的税收制度,没有去查,也没有要求私营业主必须拿回去缴税,反而是作为成本来报销的。所以,这方面在客观上也加大了贫富差距。

张吉明等:还有一些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我看到一些厂子改制,把好端端的国有厂非要改成股份制、非要改成私营厂,最后厂长、书记成了私营老板,工厂里就进行所谓的下岗、减员、增效,好多工人又成了新的贫困阶层。这样给工人一两万元买断工龄,大量财产落到老板手里。一些本来比较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厂子值几个亿,但他拿几千万、甚至几百万就买下了,这就造成了更大的贫富差距。

程:1998 年以来,这个现象反映的情况是很严重的,这是“皇帝的新衣”。大家都知道,但就是没有人来进行严格的规范和管理。我在报刊上也撰文反对你说的这个现象,我也接到过很多人的来信,有些下岗的被买断工龄的工人,甚至于大庆的工人也都写信给我。作为学者来说,我无权处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一向反对这种全世界都没有的、不正常的、极不公正的所谓改制,实际上就是私人股份化,或者说私有化或民营化。

张吉明等: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后面的“毫不动摇”畅通无阻,前面一个“毫不动摇”基本上没有行动。我觉得这个应该解决。

程:很多部门和地方政府口头上拥护和支持两个“毫不动摇”,事实上却是在毫不动摇地大规模地发展私有制。这实际上是背离党中央精神的。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而且《江泽民文选》里面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我曾经写过关于这篇研读体会的文章。江泽民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就一个,即公有制是共产党执政等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非公经济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一,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的核心,从而它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建筑。从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

来看,这些都是党中央的理论,但有关方面在理解和执行的过程中是有明显偏差的。

张吉明等:您认为真正实现共同富裕,还是要坚持公有制?在农村坚持小平同志“两次飞跃论”的思想,走集体道路,发展集体经济。

程:是的,这符合邓小平多次强调的,包括他在晚年也再次强调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革,农村和农业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两次飞跃论”。第一次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制,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次飞跃是他认为仍然要搞集体化,搞集体经济和搞集约化,不能是一家一户单纯来搞。集体经济和集约化,是相对于粗放经济来说的,邓小平多次讲到,我也专门写过文章,还召开过全国性的研讨会。但是,现在看来理论界以及有关的主管方面都撇开了这个重点,去单纯讲土地流转制度。而根据有关的实践材料,土地流转制度是利有弊的,可以搞,但是完全寄希望于土地流转制度,弄得不好这个土地所有权大部分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或者少数的私人公司那里去了。尽管最终的所有权似乎还是集体的,但是,30年不变或60年不变,实际上所有权也是架空了。所以,我认为农村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革,还是要高举邓小平关于“两次飞跃论”的思想。他曾经说过,愿意搞集体经济的仍然可以搞,不要去阻拦,不愿意搞的,没有条件搞的,继续搞家庭联产承包。在这个问题上,小平的思想是不搞“一刀切”,而且指出来联产承包搞了若干年以后,就应当逐步地进行第二次飞跃。这个思想需要重新被发掘、被重视,而且要转化成政策。

张吉明等:这个思想非常重要。小平同志始终强调到实现第二次飞跃的时候,要发展集体经济,对集体经济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现在现实中像南街村、刘庄村,还有华西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很少,全是机械化,效率非常高。

程:他们在周围的村庄也聘请了很多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也解决了一些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我查过《邓小平文选》,邓小平从一开始就主张联产承包,直到晚年,都提到了两次飞跃论,所以他的这个思想不是到晚年才有的。有些右的舆论说:

“这是薄一波同志塞进邓小平文选的。邓小平没有讲过二次飞跃论,是薄一波同志主张后塞进邓小平文选的。”后来,我说:“你相信这个话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都是经过邓小平亲自阅校、阅改的,谁敢把它塞进去,塞也不能塞上个三四次啊。

可能有人会相信,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张吉明等:因为出文集是比较严肃的事情,邓小平不容许别人给他加入别人的思想,这个咱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宣传,大力宣传。

程:南街村和刘庄那里实行的是比较标准的集体经济。华西村实行的主要是股份合作经济。严格意义上讲,股份合作经济和标准的集体经济,还是有

一定差别的。如果股份是分给大家,是合作经营的,叫股份合作制,这在国际上也是有的。有些股份全部是集体占有,没有量化到个人,就叫集体所有制。严格来说,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我们搞理论的都知道,如果非常宽泛地说,凡集体所有制,就把股份合作制也算进来了,这是指从非常广义的角度来说的;如果从严格的意义来讲,这是两种不同的所有制。我认为现在都可以倡导,都可以发展。但是,不要用联产承包制、股份合作制去贬低、矮化、否定像南街村和刘庄这样的集体经济。前几年,来自右的舆论也是造了很多南街村的谣,包括有的南方报系也有这个做法。有人让他们纠正一些基本事实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刊登纠正性的文章。这样做标榜新闻自由,实际上也是不自由的。只发表不负责任的所谓的调查文章,一旦有了负责的、真实的调查文章就不发了。这就说明,有些报纸本身是有它的基本倾向和立场的。

张吉明等:它这个自由都是虚假的,它不会给人真正的、正确的思想和自由。如果是全员合同,股份都是大家的,这是真正的集体;如果股份是某一个人的,别人很少,他很多,反而造成贫富不均。

程:那个实际上是叫私人股份制。如果股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实际上是私有制采取了股份制的方式。如果股份内部差别很小,比如只差个三五倍,就叫股份合作制,世界各国都有股份合作制。

张吉明等:我认为差别小的股份合作制,是适合中国解决贫富差距的一种方式。

程:它既能提高公平的程度,又能提高效率。如果工人占有股份较多,差别比较小,就有一种主动工作的自觉性。否则,工人觉得差别太大。你占 50% 的股份,我们 100 个人只占 50%,甚至 1 000 个人、10 000 个人只占 50%,这样的差别,等于新创造出来的财富被你一个人拿去了一半。你既拿了高工资,又拿了按资分配那一块,等于拿了两块,这样既影响了效率,又影响了公平。

张吉明等:我们保定有一个鑫丰集团,让他们改股份制,公司领导很有头脑,他让所有人都持相同的股,领导和工人都一样。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好,现在所有退休的人,照样发奖金、工资,所有的报销、医疗费等都解决得很好,大家都非常满意。我觉着这是一个社会管理科学化的典型代表,它实际上是维护稳定、安定和谐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程:这也是摆脱官僚主义、和谐干群关系、和谐劳动关系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因为你作为经理收入已经比人家多了,工资上已经体现出和一般劳动者的差别了。如果股份都是一致的话,实质上都是按劳分配了。所以,差别应当小一些,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

张吉明等: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既是市场经济,又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有的领导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尽量为职工服务。我

不能光自己得东西,否则就是以权谋私。我给大家就是以权谋公,我是为大家做事。”对这个观点,我很认同。

程:这样的共产党员和干部是应当表扬的,但现在提倡得还不够。

张吉明等: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是不是把改革发展的成果,包括积累的一些财富,采取一些方法、方式和政策,给予广大的人民。比如,是不是可以从小学到大学教育全免费,我们国家以前没钱收费,现在国家这么多钱,美国国债买了那么多,为什么不拿出一一点给人民解决实际问题?近几年,医疗解决不错,大概80%~90%的农村都可以加入合作医疗了。但是,能不能拿出一些投在教育上。再一个,汶川地震以后,看到陕西南部老房子全部被震坏了,这说明农村的老房子很多。能不能拿出一笔资金来,给农村所有的贫困家庭都盖上新房。现在搞社会主义新民居,盖成防七八级地震的新民居。这样一来,既可以拉动内需,如建材、钢铁、劳动力,又可以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实际上,这是大得民心的事,能不能有这样的思考?

程:我赞成你这个观点。现在我们每年的税收、财政收入都大幅度增长,尤其是我们的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而且长期的、大量的、主要的外汇都去购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债券,实际在经济上是极不划算的。一方面,我们花了很大的土地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等,去引进了大量的外资。它们在华投资利润率是22%,而我们辛辛苦苦通过外贸等途径赚的一点钱,没有用到国内来,而是直接购买了西方的国债,西方国债的利息是非常低的。另一方面,美元又不断地贬值,所以,我们购买他们债券的获利,实际上是零,可能还要贬值,也可能是负利息、负收入。我们也曾经开会讨论,去年我也向人大提过如何去使用外汇、如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建议。建议要适当控制外汇储备度,希望外汇能够通过各种办法,能够有效地搞活:一种是通过并购西方的各种企业包括新闻媒体,二是通过各种办法能够返回国内来使用,来尽快地改善城乡居民的生活,包括城乡居民各种养老社保问题。我认为这一下子就可以在当年解决的。农村养老每个人如果是65元的话,是用不了多少钱的,而且该数额还可以不断地提高。关键是要有新思路,有思路就会转化成政策,要达成共识。要缩小贫富差别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合理地使用好外汇。否则的话,中国人民辛辛苦苦赚来的外汇,结果获利是负的,而不是正的,这是非常令人痛惜的。

张吉明等:是的,程院长,你今天讲实现共同富裕问题非常重要。如果咱们采取了各种政策,不断地解决了共同富裕问题,那种政治影响对人民的凝聚力会更有价值吧?

程:对,胡总书记一再强调,改革的动力是人民群众,改革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改革的成果要与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发展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

利。所以,我们要继续通过改革开放,通过发展科技等来促进共同富裕。我们的 GDP 总量已经很大了,财富已经创造的越来越多了。所以,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要把分好“蛋糕”这个工作做得更好,我认为这是当务之急。做大“蛋糕”,我不否认要进行,但是当前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是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要解决好分配不公的问题,来推进共同富裕。因为共同富裕是一个过程,也是逐步进行的,不是一下子能够实现的。但是要缩小差别,推进共同富裕,这是肯定的。去年两会前,“人民论坛”曾经做过网民调查,调查问卷里有个选择:只有 2%的网民选择了“继续做大‘蛋糕’最重要”这项,而绝大多数的网民则选择了“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这说明我们这个观点不只是学者的观点,也是有人民群众基础的。在这方面应当看到,我们国家的 GDP 总量增长得比较快,年均增长超过 9%,而美国的奥巴马等人也说过,中国是总量增长快,但是中国人均 GDP 的增长没有美国快,也没有日本快。所以,我们除了要提高综合国力和经济总量以外,还要注重人均这个指标,关注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绝对值是多少,以及它的提高幅度是多少。如果中国的人均 GDP 始终都赶不上美国、日本,那么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什么时候能够接近西方发达国家呢?那就是说差距可能越来越大了。总量的差距是在缩小,但最终人民群众感觉自己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靠人均可支配的实际收入、人均 GDP 来解决的。这涉及我以前的议案,就是中国要继续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否则和发达国家生活质量相比,人均生活质量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可能拉大,这样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近 30 年,我们 GDP 增长总量、综合国力的增长速度都较快,都快于改革前,也快于西方。但是我们人均 GDP、人均生活质量的提高幅度,并没有快于美国、日本,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计划生育放松了。

张吉明等:这可能是一个方面。我觉着还存在另一个方面,中国 GDP 增长了,实际上中国的收入、效益好多没落在中国。外国先进技术、专利在咱们国家生产,咱们国家只是得到了一个很小的加工费,其他的大量财富又都给了外国了。看到的 GDP 很高,实际上中国得到的利润和收益是很少的,这种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一下。也就是说,我国发展经济的方式需要调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重要的。

程:这里面你提到了一个观点,概括来说就是中国人自己要不要搞自主创新,这个直接涉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人均收入、人均生活水平、城乡居民可支配的实际收入。我们刚才在楼下会议厅的一个《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的发布会上,很多人也提到你刚才讲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我国的外贸总额很大,GDP 总量很大,但是我们这个 GDP 是把外资在我们中国办的企业的价值都计算进去了,所以,这个 GDP 中国人民是得不到很大实惠的。外

资在中国办厂,中国只拿了一个加工费的零头。比如说,苹果手机这个产品,假定是卖 200 美元,其中中国人只拿到几美元的加工费,在税收方面有时候还免掉一些,超国民待遇还优惠掉一些税收,还留下污染、消耗土地资源等。但是,出口的时候这 200 美元都算中国的,实际上 GDP 增长的百分之九点几的速度,就包括了这部分,外贸的总量里面也包括了这部分,而这是中国人民得不到的实惠。因此,应该调整外贸结构,应当调整 GDP 结构。我们“两会”代表过去说过,不仅应当统计国内生产总值,而且要统计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中国人办的企业所创造的价值(GNP)也应当统计,但是,国家统计局始终没有接受“两会”代表的意见。GNP 都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财富,中国人可以分配的,包括中国人到外国去办的企业,那部分收益也是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所以,自主创新很重要,直接关系到民生。

张吉明等:如果自主创新,专利技术是中国自己的,这部分利润可以都为咱们中国老百姓所享有。

程:对。有一种错误的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总部搬到中国来了、研发中心也搬到中国来了,似乎中国人的技术就可以大幅度地提高。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研发机构到中国来是干什么的,是利用你廉价的高科技人才,创造出的高端产品是容易在中国形成垄断的,形成控制的。我们中国三十几个重要产业部门,前几家都是外资的。所以,这些部门被控制了以后,对国家、对老百姓实际生活、物价和就业问题等,都会产生较大的负面作用。这方面因为中国报刊、主流报刊讲得很少,我们许多学者心中都很有数,也写过文章,但是没有转化成政策。所以,政府部门应当和有关的学者联合起来认真讨论这件事情,来真正贯彻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的关于经济建设的八条举措之首,即自主创新。但是,有些人仍然拿着西方经济学上讲的比较利益,主张搞“三来一补”、搞合资生产、搞被外资控制的生产、搞贴牌生产(贴外国品牌的中国制造,而非真正的中国创造)。在中方要不要控股,要不要控制核心技术,要不要控制品牌等问题上,大家是有不同意见的。目前,我们的意见可能还是少数人的意见。

张吉明等:我认为那种人的意见,失去了中华民族那种自主创新的气节,是错误导向。胡锦涛总书记说过: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像他们那样的错误导向,对咱们的企业、咱们国家的自主创新是非常有危害的。

程:是的。经济安全问题、产业安全问题、自主创新问题,都直接涉及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问题。它从总的方面形成了一个格局,也是个人很难改变的。

张吉明等:我感觉是不是西方的文化渗透把咱们一些人的思想观念给改变了。用人家的错误理论来指导中国的行动,我觉得这个确实应该值得我们重视。

程:是的。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尔库塞等人的概念来分析,就是西方通过国民教育、通过各种媒体等,实际上把广大人民训练成了“单面”人,单向度思考的人,只会顺着大垄断寡头所制造的一套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来思考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种拒绝的心态。那么,这种舆论渗透到中国来的结果就是,包括一些著名党校的教授,都提出了要用西方经济学来驾驭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然后把高举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放在最后一段要高举一下,这实际上是架空了。他们认为西方经济学三个假定、三个基本原理、三个方法,全是真理。主张每个人(包括公务员)都应当成为自私自利的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学也是这样说的。这样使得腐败官员现象越来越严重。不讲诚信得到了西方经济学、包括公共选择理论上的认可,这就是试图单独靠法律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所以,在这方面理论界的错误理论误导也应负有重要的责任。

张吉明等:肯定是的。中国现在出现的不良现象、道德的滑坡,甚至官员的腐败,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就是价值观错了,信奉自私(经济人假设,人都是自私的)都是个人主义价值观造成的。很多问题中的哪个不是个人主义造成的?如果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就不会搞腐败。中国只有彻底解决了个人主义价值观问题,才能真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如果还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话,最后可能会把这个旗帜给丢了。

程:是的。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曾经写过亚洲的八大趋势。当时我跟他谈时,主张亚洲之所以发展得比欧美要好一些,就是亚洲(包括新加坡、日本、中国)的价值观。我们是讲集体主义,在日本就叫团队精神,它与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个人主义西方文化,可能有一定的差别。美国的文化犹如美国重要的政治家,写《大失控和大混乱》的作者布热津斯基曾经讲过的,因为美国流行极端个人主义,所以导致了很多问题。亚洲一些国家还有集体主义,有一些团队精神,新加坡也有一些儒家教育,这样就弥补了极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严重缺陷。我们中国要更加强调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但是,由于受西方意识形态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在这方面现在也弱了一些。你去看看孙中山说的“天下为公”,尽管他这个“公”不一定是我们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公”,但他也是主张大企业应当是国有的,国有企业应当是为大家谋利的。

最近几天,世界银行行长和政府方面的研究机构,认为可能要进一步改制国有企业。如果是顺着过去那些有严重缺陷的改制方式继续下去的话,那将会导致新一轮的私有化。这在前几天舆论中出现以后,已经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包括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评,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应当通过民主的形式来研究。我在本届人大第一次大会期间曾经提过一次政策议案,建议国有资产管理部門应当向全国人大专项汇报关于国有资产的改革。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法律,订立时的民主性也不够。我当时提的六条意见一条也没有被人大采纳。所以像如何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这样的重大问题,理论上说,既然说它是全国人民的财产,就应当由全国人大来确定;不应当简单地由政府有关部门说了算,而应当充分发扬民主,由全国人大按照宪法规定来进行改革、发展。总的来说,只有按照宪法和党章的要求,继续做大、做实、做强、做优国有经济和公有经济,才能确保公有制占主体,不被某些人所架空。我们“两会”代表,包括中国社科院的原马列所所长李崇富政协委员、原新闻所所长喻权域政协委员等,他们都曾经向政协提交过建议,同时希望国家统计局恢复统计各种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刘国光同志也提出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法管理,应当按照国家宪法来进行管理。宪法规定公有制占主体、国有经济占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统计上就要说明这一点。如果不统计,那怎么能行呢。而国家工商联等部门却经常公布一些非公经济、民营经济所占的比重。这样一种现象本身就不正常。这应该由国家统计局统计,这属于统计局的业务范围。如果不统计,应当向公众说明原因。

张吉明等:有文章说现在应当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公有制为主导,而现在民营企业已经到了主体的地位了。这个事情关系到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存亡,关系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命运。正如您刚才说的,就应该按照宪法、由全国人大来制约这种行为。

程:是的。你提到这篇文章当时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人民大学的一级荣誉教授卫兴华曾经写文章批评了这一点。他认为各级干部公开讲话,以及中央的主流媒体,应当按照宪法和党章来办事。在没有正式改革之前,不宜发表和宪法、党章相冲突的观点,可以先进行内部探讨。你不能说马克思主义观点只能在内部探讨,而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就可以在第一主流媒体发表意见,这显然是一种不适当的处理办法。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让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世界各国的人民、各国的共产党都能够认可的话,所有制的问题就要坚持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提的,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公有制经济不仅要有量的优势,而且要有质的优势。也就是说,公有制经济质和量上都要占优势。量上占优势,不仅表现在社会总资产,而且表现在经营性资产上,就是在资产、就业、税收和经济总量等各个方面,都应当体现出量的优势。当然,有的方面